

汉书学史

(现当代卷)



杨倩如

著



人民出版社



汉书学史

(现当代卷)



杨倩如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封面设计：黄桂月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书学史. 现当代卷 / 杨倩如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2

ISBN 978 - 7 - 01 - 019968 - 9

I. ①汉… II. ①杨… III. ①中国历史—西汉时代—纪传体 ②《汉书》—研究—20 世纪 IV. ①K234. 104.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43391 号

汉书学史

HANSHUXUE SHI

现当代卷

杨倩如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1. 25

字数：50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9968 - 9 定价：100. 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河北大学历史学强势特色学科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出版缘起

河北大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921年的天津工商大学，后改称天津工商学院、津沽大学、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师范大学。1960年定名为河北大学，1970年从天津迁至古城保定。河北大学的历史学科，创建于1945年天津工商学院的史地系，侯仁之院士出任首届系主任。聘请齐思和教授讲授中国通史，1946年9月至1948年先后由方豪、王华隆任系主任。1949年1月天津解放，钱君晔任系主任。1952年王仁忱出任系主任。1953年史地系分为历史系和地理系。在20世纪50—60年代，河北大学历史学科以拥有漆侠、李光壁、钱君晔、傅尚文、周庆基、乔明顺、葛鼎华等史学专家，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创办《历史教学》杂志而著称于世。改革开放以来，河北大学历史学科再创佳绩，获得全国第二批、河北省第一个博士点，建成全国宋史界唯一的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处挂靠于此，并负责编辑出版《宋史研究通讯》。2005年以来，又获得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建成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河北大学历史学科被评定为河北省强势特色学科，2009年1月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成立，本学科获得空前大的支持力度，迎来更新更好的发展机遇。2011年全国学科调整后，中国史成为一级学科博士点，世界史、考古学成为一级学科硕士点，另有中国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宋史研究中心和历史学院的关系是“各自独立，资源共享，密切合作，共建历史学科”；目前共有教职员工60余人，下设“三系七所”等教学研究机构。在继续编印《宋史研究论丛》（CSSCI来源集刊）和《宋史研

究丛书》的同时，我们决定隆重推出《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该丛书编委会成员除河北大学历史学强势特色学科建设领导小组外，主要有：郭东旭、刘敬忠、郑志廷、汪圣铎、张家唐、闫孟祥、刘秋根、刘金柱、吕变庭、杨学新、雷戈、肖爱民、肖红松等先生。

研究历史，教书育人，奉献社会，是我们的天职。

不吝赐教，日新月进，臻于完善，是我们的期待。

最后，衷心感谢各级领导和各位专家对本学科的长期厚爱和支持。特别鸣谢人民出版社对《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的鼎力襄助。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河北大学历史学强势特色学科建设领导小组

组长：姜锡东

成员：王菱菱、范铁权、丁建军

序

王子今

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史《汉书》，是公认的史学经典。人们都注意到，由于作者班固生活在儒学确立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东汉时期，历史观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以致《汉书》的历史批判精神显得较《史记》逊色。然而这部史学巨著的完成，体现出司马迁之后又一位史学大家的思想和学术个性。班固有意补足《史记》“太初以后，阙而不录”的缺憾，其学术风格也自有优长，如《后汉书》卷40《班固传》所说，其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馱”。比较马班、《史》《汉》，是历代学者热议的话题。宋代思想家朱熹说：“《太史公书》疏爽，班固《书》密塞。”（《朱子语类》卷6）明代学者王鏊写道：“《史记·董仲舒传》不载《天人三策》，贾谊与屈原同传，不载《治安》等疏，视《汉书》疏略矣。盖《史记》宏放，《汉书》详整，各有所长也。”（《震泽长语》卷下）黄淳耀说：“马疏班密，向有定论。”但是又指出：“然亦论其行文耳，其叙事处互有疏密。”（《陶庵全集》卷4）邱逢年《史记阐要·班马优劣》又作了这样的总结：“《史记》变化，《汉书》整齐；《史记》宕逸，《汉书》沈厚。”杨慎则以李杜诗风比喻《史》《汉》：“余谓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三《凡例》也有“马班之史，李杜之诗”的说法。

《汉书》研究，是文献学与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主题。《汉书》行文有喜用古字古训的特点，读来往往辞义艰涩，多有难解之处。成书不久，服虔、应劭已经开始为《汉书》注音释义。魏晋南北朝以后出现的《汉书》音注研究论著更多。赵翼《廿二史札记》说，隋唐时代，“《汉书》之学大行。”颜师古《汉书叙例》列有《汉书》注家凡23家。据《新唐书》

卷44《选举志上》记载，当时科举考试科目中，是包括史学内容的。而《汉书》，是所“试”主题之一。关于宋代的“《汉书》学”，《宋史》卷319《刘奉世传》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奉世优于吏治，尚安静，文词雅赡，最精《汉书》学。”据说苏轼读《汉书》并总结出治学经验：“尝有人问于苏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学乎？’曰：‘可。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参伍错综，八面受敌，沛然应之而莫御焉。’此言也虞邵庵常举以教人，诚读书之良法也。”（〔明〕杨慎：《丹铅余录》卷10）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也曾经说到读《汉书》的情景：“每相聚，辄读数叶《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山谷集》外集卷10《与宋子茂书》）洪迈曾经评价《汉书》的学术品质：“班固著《汉书》，制作之工，如英茎咸韶，音节超诣。后之为史者莫能及其髣髴，可谓尽善矣。”（《容斋随笔》三笔卷2“《后汉书》载班固文”条）这当然是倾心研读的体会。清代朴学学者重视《汉书》学。他们完成的比较重要的《汉书》研究资料，可以简略列举如下数种：

1. 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杂志》；
2. 沈钦韩《汉书疏证》；
3. 周寿昌《汉书注校补》；
4. 钱大昭《汉书辨疑》；
5. 朱一新《汉书管见》；
6. 沈家本《汉书琐言》；
7. 王先谦《汉书补注》。

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无疑是《汉书》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其中所征引的《汉书》学研究专著多达67家。

《汉书》学的学术源流清朗，学术层次明晰，学术积累深厚，学术创获丰富，在中国传统正史文献研究的系列中形成独自的品质和格局，值得学界珍视。

20世纪以来，中国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新的境界。事实上，历代对于《史》《汉》的研究，确有重《汉》轻《史》的传统（周洪才：《历代〈汉书〉研究述略》，《齐鲁学刊》1987年3期），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这一倾向竟急骤扭转，又出现了重《史》轻《汉》的偏向。据统计，1900年至1990年“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专著出版102种，“班固与《汉书》”研究专著则不过33种。（张传玺主编：《战国秦汉史论著续

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87—793页）这当然只是不完全的统计，而《史记》研究成果显然遗漏更多。重《史》轻《汉》倾向发生的原因，有学者曾经这样分析：“《史记》在思想性、开创性、文学性方面远胜于《汉书》确是主因。”（周洪才：《历代〈汉书〉研究述略》，《齐鲁学刊》1987年3期）其实，思想史学者、史学史学者和文学史学者的广泛参与所体现的，还只是表面的和浅层的现象。从历史文献研究的角度来说，似乎还应当深刻检讨100年来对于朴学传统的贬斥，对于实证主义学风的背弃。现当代《汉书》研究的成就虽然在数量上未能与《史记》研究并重，但是仍然有若干学术精品发表，新的研究方法的发明和应用，也体现出无愧于这一进取的时代的科学价值。

杨倩如博士潜心多年从事“《汉书》学”学术史研究。终于面世的《汉书学史（现当代卷）》是她累年学术思考所得收获的总结。

《汉书学史（现当代卷）》介绍了《汉书》在东亚和欧美的研究概况。对于20世纪中国的《汉书》研究，则区分“20世纪前期”（1900—1949）、“20世纪中期”（1950—1979）、“20世纪后期”（1980—2000），分别论说。对杨树达《汉书窥管》、陈直《汉书新证》等名著均有所分析评价。“岑仲勉的《汉书》研究”、“冉昭德的《汉书》研究”，以往治《汉书》学术史者涉及不多，杨倩如都进行了有价值的说明和评断。其中“冉昭德的《汉书》研究引发的争论”一节，读来可以对《汉书》研究史的一个特殊情节有所反思。作者写道，据冉昭德日记显示，“标点《汉书》的‘出版说明’原本指定由他撰写，但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汉书》却未采用其原稿，而是进行了大幅修改，强调‘只有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彻底批判《汉书》中的反动儒家思想，正确处理这些史料，才能对西汉历史作出科学的总结，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显然，《汉书学史（现当代卷）》作者是在全面的资料准备工作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分析的。

作者在《汉书学史（现当代卷）》的最后一部分又专辟一章言“新世纪的《汉书》研究（2001年至今）”，也是有意义的。有关“利用出土文物和最新的考古成果”以及“构建现代‘汉书学’的理论体系”等意见，都是有价值的中肯的建议。

《汉书》的作者虽然是以记述西汉历史为任务，但是全书内容也包括刘邦集团反秦并战胜项羽集团创建汉王朝的历史，自然涉及秦史及秦汉之际的历史，对于新莽史的记录，也是最为完整的。作为秦汉史研究者，我们重视《汉书》的史料价值，也不能不密切关注《汉书》研究的学术动向。而自己研读《汉书》的若干片断点滴的学术心得，或许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有益于《汉书》研究的推进。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以为《汉书学史（现当代卷）》的学术意义应予肯定。

谨此祝贺《汉书学史（现当代卷）》面世。同时也相信杨倩如博士会以诚恳的态度面对学界的检验。

王子今

2018年8月23日于北京大有北里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中国传统“汉书学”发展概述	2
第二节 对《汉书》研究成果的回顾与综述	13
第三节 本课题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45
第一章 《汉书》在日韩的传播与研究	54
第一节 古代东亚的《汉书》研究	54
第二节 20 世纪以来日本的《汉书》研究	81
第三节 20 世纪以来韩国的《汉书》研究	110
第二章 《汉书》在欧美的译介与研究	115
第一节 《汉书》在欧美的译介与早期传播	116
第二节 20 世纪以来欧美学者的《汉书》研究	132
第三章 20 世纪前期中国的《汉书》研究(1900—1949)	162
第一节 近代学术转型之下的《汉书》研究	162
第二节 现代历史学科的构建与《汉书》研究的新进展	184
第四章 20 世纪中期中国的《汉书》研究(1950—1979)	199
第一节 《汉书》点校本和普及读物的出版	199
第二节 《汉书》文献研究的重要进展	208
第三节 20 世纪中期围绕《汉书》进行的论争	224

第五章 20 世纪后期中国的《汉书》研究(1980—1999)	236
第一节 走向复兴的《汉书》研究	236
第二节 继承创新的港台《汉书》研究	257
第六章 新世纪的《汉书》研究(2001 至今)	269
第一节 《汉书》文献整理与各项研究的新进展	269
第二节 班固与班氏家族史研究概述	321
第三节 《汉书》的教学、传播与普及	347
余论 反思与展望	357
参考文献	365
附 录 《汉书》古籍文献和现当代研究论著目录索引	368

绪 论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皇朝史。自成书以来，在学术史和文化史上享有尊崇的地位。“二十六史”中有 19 部仿照它的体例编撰^①，《汉书》因此成为中国古代官修正史的范本，被历代史家、学者视为“命代之奇作”、“五经之亚”而“共行钻仰”。历代均有人对《汉书》进行注释、校勘、评点、刊刻、改编和研究，产生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从而形成了一项“专门之学”——“汉书学”。

古代“汉书学”成果丰硕、名家辈出，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其总体成就和专项研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梳理和总结。20 世纪以降，西方学术思潮的引进带来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和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汉书学”从传统经、史、子、集的分类体系——“史部”的一项专门之学，逐步演化为现代文、史、哲学科体系中历史学所属之中国史学史、秦汉史等分支学科的研究课题。然而，至今尚未有人对古今“汉书学”的研究状况与发展进程进行专门考察，对于 20 世纪以来数量众多的《汉书》研究成果之重视和利用尤嫌不足。

当前，对《汉书》文本、作者及其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明确“汉书学”的概念范畴、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发展路径，是一个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有鉴于此，本课题拟对 20 世纪以来的《汉书》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梳理，回顾《汉书》研究的总体态势，对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研究者和研究机构进行评述，以期在此基础上对现当代“汉书学”作宏观的理论建构和前景展望。

^① 这 19 部纪传体史书为：《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新元史》。

第一节 中国传统“汉书学”发展概述

《汉书》自开始流传即具有很高声誉,《后汉书·班固传》云:“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学者们研读《汉书》蔚然成风,自东汉中后期便开始有人对其加以注释,之后历代史家、学者推崇《汉书》,纷纷对其进行改编、注释、考订、评议,最终发展成为一门发达的“汉书学”。

一、“汉书学”的兴起（东汉魏晋南北朝）：“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东汉魏晋南北朝是“汉书学”的兴起与形成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在于音义研究,其中一方面是由于《汉书》好用古字、行文简奥,学者以注经方式研治《汉书》,可获得较大的学术发挥空间;另一方面,则是受到汉末以降经学研究相对式微、史学研究走向独立发展的学术大势之影响。这一时期《汉书》音义研究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以师法口授来传习《汉书》。如马融从班昭受读^①、蔡邕师事胡广问《汉书》以补《汉志》^②、张休从张昭受读以授孙登^③、刘殷以《汉书》为家学授其子^④、陆士季从顾野王学习《汉书》^⑤等。这种形式多见于汉末魏晋之际,目的在于通晓《汉书》文意,就研读《汉书》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探讨、解惑,并“习知近代(西汉)之事”。这在某些方面已初步具有了研究性质,对后来专门的音义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二是专门以《汉书》注释为业。已知最早注释《汉书》的人是汉桓帝时的延笃^⑥,其他注家有荀悦、服虔、应劭、伏俨、刘德、郑德、李斐、李奇、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晋灼、刘宝、

① 《后汉书》卷84《列女传·曹世叔妻传》。

② 《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注《邕别传》,《续汉书·祭祀志下》注补引蔡邕《表志》。

③ 《三国志》卷59《吴书·吴主五子传·孙登传》。

④ 《晋书》卷88《孝友传·刘殷传》。

⑤ 《旧唐书》卷188《孝友传·陆南金传》。

⑥ 李奇注《汉书·天文志》“流星下燕万载宫极”下引“延笃谓之堂前阑盾也”。

臣瓚、郭璞、蔡謨、崔浩^①，以及项岱、刘显、韦稜、顾野王、崔慰祖、诸葛亮、刘孝标（刘峻）、陆澄、梁元帝（萧绎）、姚察等。其中尤以服虔、应劭、晋灼、臣瓚、蔡謨等为名家。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书》成为文人学者关注的对象，出现了许多精熟《汉书》并专门从事抄录、参校的学人。《汉书》亦成为这一时期士人切磋学术、文化交流的媒介。如西晋贾谧请左思讲授《汉书》^②；南朝刘显考察韦载有关《汉书》的知识^③；以治《汉书》闻名的南朝学者姚察出使北朝，刘臻私下向其请教《汉书》问题十余条^④。在两国敌对的状态下，一方学者不避嫌疑、虚心求教，另一方耐心解答、诲人不倦，此事“成为了南北朝时南北之间文化交流的佳话”^⑤。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班固和《汉书》成为当时品鉴学者才情的依据。如谢灵运认为殷仲文善属文但读书少，“若殷仲文读书半袁豹，则文才不减班固”；^⑥崔陵素与魏收不协，“收既专典国史，陵恐被恶言，乃悦之曰：‘昔有班固，今则魏子。’收笑而憾不释”。^⑦《汉书》的学术魅力，由此可窥一斑。

统治者也十分重视《汉书》，将其视为必读的历史教材。例如东汉末年，汉献帝因《汉书》篇幅太长、难以遍览，而令荀悦改作《汉纪》；^⑧三国时期，吴主孙权不仅自己研读“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还让太子和臣下阅读《汉书》；^⑨蜀主刘备临终遗诏，敕谕后主刘禅专读《汉书》。^⑩又如十六国时期，匈奴左贤王刘宣“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覆咏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终不令两公独擅美于前矣！’”后赵

① 上举23家为颜师古《汉书叙例》中所列。另据孙钦善考证，这23家除荀悦与崔浩外，“其他皆为《汉书》的直接注家”。孙钦善：《汉末魏晋时期〈汉书〉注家考略》，《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② 《晋书》卷92《文苑传》。

③ 《陈书》卷18《韦载传》。

④ 《陈书》卷27《姚察传》。

⑤ 陈其泰：《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73页。

⑥ 《晋书》卷99《殷仲文传》。

⑦ 《北齐书》卷23《崔陵传》。

⑧ 《后汉书》卷62《荀悦传》。

⑨ 《三国志》卷52《张休传》。

⑩ 《三国志》卷32《先主传》。

主石勒“常使人读《汉书》，闻酈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①

在统治者与文人推崇《汉书》的同时，《汉书》也开始在民间广为传播。被学者称为“俗说”和“世俗传道”的民间通俗讲史活动，对《汉书》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文人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整理、编辑与《汉书》有关的史料、传说及各种异闻轶事，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专门吟咏、记述西汉人物、故事的诗歌、散文、笔记、小说，构成了《汉书》早期传播的成果。^②

二、“汉书学”的繁荣（隋唐）：“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

隋唐时期的《汉书》研究成就斐然，“汉书学”成为一门发达的学问。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概述唐前学者尊奉《汉书》的情况：“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③这是将《汉书》推崇到仅次于儒家五经的地位，究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官方的大力支持：或指派学者专事研读或改编，如东汉时期马融执弟子礼受《汉书》，荀悦受命将《汉书》改编为《汉纪》；或由统治者亲自倡导诵读并推动研究，如《梁书》载刘之遴受皇太子之命与众学者参校《汉书》真本，唐代颜师古受太子之命注《汉书》。此外，梁元帝萧绎曾亲注《汉书》，唐代亦出现了君主亲自铨定的《御铨定汉书》（《新唐书·艺文志二》）。“汉书学”一词，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④。标志之一是唐穆宗于长庆三年设“三史”科^⑤，将《史记》《汉书》《后汉书》钦定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及各级学校的专用教材，这说明研读《汉书》已成为读书人步入政坛的途径之一。

“《汉书》之学，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为业。”^⑥隋唐之际“汉书学”兴盛的另一显著标志，是涌现出一批专治《汉书》的学者，有姚察、刘臻、杨汪、萧该、包恺、颜游秦、颜师古、敬播、刘伯庄、刘讷言、秦景通、秦晔等。著有《汉书》研究专著的，有张冲、于仲文、僧务静、李喜、顾胤、

① 《晋书》卷105《载记·石勒下》。

② 据笔者统计，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汉书》人物、事件为题的诗歌、辞赋、散文计有70余篇，另有笔记、杂传、小说计十余部。

③ （唐）刘知幾：《史通》外篇二《古今正史》。

④ 《新唐书》卷198《儒学传上》。

⑤ 《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

⑥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20“唐初三礼汉书本选之学”。

元怀景、沈遵、李善、姚珽、王勃等；以精通《汉书》闻名的，还有王仲通、阎毗、任希古、王方庆、李德裕、赵弘智、浑瑊、李密、裴炎、郝处俊、郗士美等。这一时期学者从事《汉书》研究仍主要以注疏训释为主，且注重师法传承，“习《汉书》者”如果不经专门宗师指授，“则谓之不经师匠，无足采也”。^①如姚察→姚思廉→姚珽、刘臻→杨汪、萧该→阎毗、王仲通→包恺→李密、顾野王→陆士季、刘讷言→李贤、任希古→王方庆（王綝），等。有些学者为世人所尊崇，号为“宗匠”。如隋代萧该、包恺教授《汉书》，弟子数千，门庭若市；^②另，唐代“为《汉书》学者”刘讷言，“亦为当时宗匠”；^③再如，世称“大秦君”的秦景通和“小秦君”的秦暉，“当时习《汉书》者皆宗师之”，甚至“非其授者，以为无法云”。^④以是观之，隋唐时期的“汉书学”，不仅涌现了一些著名学者，而且已形成了若干学派，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

颜师古的《汉书注》代表了汉末至唐代《汉书》研究的最高水平，无愧于“班孟坚忠臣”之誉。^⑤颜师古注《汉书》，是在太子李承乾的支持下，因袭叔父颜游秦《汉书决疑》的成果，遍采前人23家注释，撰成《汉书注》，得到了唐太宗的赞许与褒奖。^⑥《汉书注》将《汉书》原文115卷析成120卷，在“文字校勘，史实考订补充，注音释义解字及典章制度注释诸方面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它的问世使《汉书》训读问题基本得到解决”。^⑦

刘知幾是第一个对《汉书》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史官与学者。他将《汉书》誉为“五经之亚”，即仅次于儒家“五经”的重要典籍，对《汉书》的编撰体例、结构、论赞、采撰、言辞、叙事、编次等方面的得失优劣，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批评，并从历史编撰和政治思潮两个层面，揭示了自魏晋以来《汉书》逐渐显要、至隋唐时期发展成一门繁盛兴旺的“汉书学”之深刻动因，可视为隋唐之际“汉书学”在理论上的总结。

隋唐时期，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汉书》的传播载体和形式更为

① 《旧唐书》卷189《儒学传上》。

② 《隋书》卷75《儒林传·包恺》。

③ 《旧唐书》卷189《儒学传上·刘讷言》。

④ 《旧唐书》卷189《儒学传上·秦景通》。

⑤ 《旧唐书》卷76《颜师古传》。

⑥ 《旧唐书》卷73《颜师古传》。

⑦ 许殿才：《汉书研究的回顾》，《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68页。